

史學家繆鳳林

張效乾

編者按：臺灣師範大學、臺北工專教授張效乾先生，生前曾經慨允為中外雜誌抒寫一系列的近代史學家評傳。惜乎僅祇完成：「史學家繆鳳林」一文，效乾先生遽歸道山。謹將史學權威程光裕教授所撰：「張效乾與史學教育」和張效乾撰寫「史學家繆鳳林」同時刊出，以紀念張效乾教授，敬請讀者注意。

南雍（註一）學府人才薈聚

繆鳳林先生（西元一八九八——一九五九），字贊虞，浙江富陽人。幼年苦學，博覽羣籍，國學根柢深厚。文筆蒼勁有力。繆氏為文，上能會馬班辭句之妙；下亦足效唐宋疏宕之致。其風格決非囿於一家。我們讀繆氏文，不僅發現其常能融歷史典故於無跡；更佩服其文章，考訂翔實，文中秀句名言，令人心折。

繆先生中學畢業後，於民國八年夏，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國文史地學部肄業。此時南高師校長是郭秉文博士，所聘師資，多負盛名。有為留學歐美返國的學人；有為國內飽學之士。兼容並包，融中西學術教育於一貫。當時校內有幾位國學大師，不僅對中國文化，有透徹的研究，而且具有卓越的見解。繆贊虞氏入校後，從柳翼謀（詒徵）先生遊，治學極勤，研讀經史尤力。加之南高師設校於山明水秀的南京，正是學子讀書最佳的處所。繆公的同班室友張曉峯先生說：「南高師的自然環境，在全國各大學中，可稱是唯一的。課餘之暇，在臺城上散步，看鍾山上的月出，

揚子江頭的落照，真有瀟灑自得之意。」（張其昀等著：中華民國大學誌。）南高師的校址，有千餘年的歷史淵源，自劉宋四學（註二），蕭梁五館（註三），以迄明代的國子監，先後輝映。

返京東裝大陸沉淪

民國十二年，繆氏南高師畢業，即應東北大學之聘，去瀋陽講授歷史。在東北大學任教五年。民國十六年六月，東南大學（南高師為東南大學的前身）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，翌年三月，又改為國立江蘇大學，旋又改稱國立中央大學。繆氏於民國十七年南歸，應中央大學之聘，住南京居安里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隨中大遷重慶。在中大歷史學系任教，垂二十餘年。後來中大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，聘繆氏兼任系主任。民國三十八年二月，南京淪陷前，繆先生曾攜一部分藏書來臺灣，當時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先生，曾約見繆氏，擬請渠主持某一文獻機構，於是他決定同返南京，準備束裝，遷來臺灣定居。不料到了南京，中大當局忽然請他出任文學院歷史學系主任。未幾，共軍陷南京，消息隔絕，後來聽說他被

送到東北勞改，南歸後，「病休多年」而逝世。繆氏早年喪偶（註四），後雖續絃，及抗戰軍興，聚少離多。聞繆氏卒前，「生活尚好」，身後蕭條。

綜觀繆氏一生，研讀經史，孜孜不倦，兼亦探求日本史，尤喜讀黃遵憲的「日本國志」。而對佛學（註五）、地理學亦有研究，並有著作發表，茲就其學術成就、愛國思想，說明如後：

探討古史識見精到

繆先生對古史的研究，甚有成就，發表論著亦多。茲舉一例。民國三十四年二月，某君對殷商以前，夏朝之有無，發生疑問，曾致書繆氏。繆復某君書曰：「吾國信史，始於殷商，二千年前，已有為是說者，邇來已屢成定論。學校講習古史，率以殷為斷。自殷以前，非闕而不論，即一切以神話傳疑目之。然竊有疑焉。夫殷史之可信，以有甲骨卜辭之證明，是則然矣。甲骨出土於洹水南殷墟者，大抵為盤庚至帝辛時代之物，凡所契刻，以貞卜於祖先之事為多。故於考訂殷代王室世系名號，最有裨益。自海寧王氏撰『殷

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』及『續考』後，言殷史者，殆無不奉爲圭臬。王氏於自湯而下之殷王，皆稱先王，自湯而上，若相土、若季（史記殷本紀作冥）、若恒、若亥（史記作振）、若上甲微以及報丁、報乙、報丙、示壬、示癸（史記作主壬、主癸）皆稱先公。此先公、先王之分，奚自來乎？曰殷自湯有天下，故繼世爲君者，後嗣得尊稱先王；若自湯而上，猶爲諸侯，故雖相土季亥之功烈，著稱經傳，亦僅稱爲先公，不得與自湯而下之諸侯同尊。古者王朝與諸侯並峙，有王朝，斯有王朝所屬之諸侯，有諸侯，亦必有爲諸侯所隸屬之王朝。王氏先公之稱，爲商自湯以前，猶爲諸侯之明證。商之先公，正夏之諸侯也。若謂夏之有無不可知，則自相土，下及示癸，究在何代爲諸侯乎？」王國維的考據，是根據甲骨文的下辭。繆氏的論斷，頗能使學者信服。

圖書評論質直細密

繆先生評論學術，不僅先要下過一番苦功，而且用過深思。沒有根據，決不操筆。他的學術評論極多，效舉一例。評夏曾佑著：中國古代史（註七）。夏先生的中國古代史，原名中國歷史教科書，共三冊。分別出版於光緒三十年、三十一年、三十二年。由上古至南北朝爲止。中國古代史篇首，編輯概略言：「本書於民國三年草成。」大概是根據舊書（教科書）加以增訂。夏先生逝世於民國十三年，中國古代史是二十三年一月重排出版。他的著作雖少，却深受學術界的敬重。所以他逝世後，梁任公爲文悼之曰：「穗卿

（曾佑）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，是我少年時代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。（註八）」繆先生對夏書的評論，瑜多於瑕。一方面對書的內容，表示敬意；另一方面他覺得大學教本，決非翻印三十年前的中學教科書所能了事的。不過當時中國歷史教科書，甚爲缺少。十九世紀末葉以後，日本學者，寫了幾本簡明的東洋歷史教本，如那珂通世的「支那通史」，共五冊；桑原鷗藏的「中等東洋史」，共二冊。頗得國內學者的好評。羅振玉評「支那通史」說：「支那通史者，日本那珂通世所作也。都若干卷。取精於諸史，而復縱橫上下於二千餘年之書，以究吾國政治風俗之變遷，簡而賅，質而雅。」又曰：「此非所謂良史者歟？」（註九）」梁任公評桑原所著的中等東洋史：「爲晚出之書，頗能包括諸家之長，專爲中學校教材用，條理頗整。（註一〇）」繆鳳林氏認爲「夏先生當時的聲譽和地位，猶在梁任公和羅振玉之下，但在他們（梁、羅）極力推崇日本人寫的中國歷史教本時，夏氏却以二十四史爲底本，自闢蹊徑，編著中國歷史教科書。」「我們拆除了種種的成見，細細考察三書的內容，便見夏的著作，實有獨到之處，非那珂、桑原二君的書所能及。」

繼則列舉夏書的優點。如：「論古今世變的大概」、「論歷史之益」、「對孔子的敘述」、「前漢高祖之政治」、「論桀紂之惡」等，「不僅有深入淺出的敘述，且有平允通達的見地。」雖然也指出書中缺點，可是瑕不掩瑜。這一部中學歷史教科書，商務印書館，忽然於民國二十三年一月，以「大學叢書」名義，重排出版，繆氏認爲「不但爲夏先生所不及料，也可以說是史學界的不幸。」此書固然寫得很好，但是作爲大學國史教本，有待商榷。除評夏著的中國古代史外，繆先生對章宗祥的中華通史上冊，亦有評論。其他如「評傅斯年：東北史綱卷首」、「評王世杰：平均地權的方法」、「評戴季陶：日本論」、「評王桐齡：新版東洋史」、「評王芸生：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」等。均有精闢的見解。

武力抗日學術報國

贊虞先生在南高師讀書時，嘗從柳翼謀先生修讀日本史。課外讀黃遵憲著的「日本國志」。黃氏嘉應（梅縣）人，字公度，於光緒三年，隨何如璋出使日本，任參贊。歷四年餘（明治十年至十五年），苦心孤詣，搜集二百數十種資料，以十年的心血，寫成一部四十卷的「日本國志」（左舜生：近代中、日、韓三國關係史）繆先生看到黃書「採摭之繁富，論斷之明通。」極爲欽佩。又感日人修習中國史，且有著述者甚衆。「黃氏歿後數十年，在我國人中，求一書能繼『日本國志』後者，杳不可得。」於是激起他撰寫「日本通史」的雄心。他在東北大學及中央大學任教時，均曾開授日本史，蒐集史料，不遺餘力。最初得到的，不過是清代日本人人用漢文所撰的日本史，以及黃遵憲後，國人所撰寫的或由日文譯述過來的日本史。繼則尋找清代以前，中日人士的撰著，兼及晚近日人的著作。最後才購得正續日本國史大系。九一八事變後，國事陵夷，愛國

青年熱血沸騰，奔走呼號，可惜無補於實際。繆氏認為「近世國族之鬥爭，欲求其勝利，必求全民族活動之任何方面，皆能與敵人相抗衡。以吾國國史之繁多，彼日人以東洋名史者，都以十數。而我國則自黃遵憲歿後，撰寫日本史者，竟未有以雪此恥。會方有中國通史之作，無暇從事，姑先就已作論文及日人論著若干篇，編為日本論叢第一集。後有撰述，當續出二集、三集，期以十年，可得論文數十篇。然後刪繁就簡，則日本通史或有殺青之望乎？」（註一一）這部論叢，共有論著十一篇，前四篇為繆氏的論文，首篇「日本史鳥瞰」，即係作者對日本史作概括的敘述。第五篇以後，是日人大隈重信等的撰述。最後則為繆先生所寫的「明人著與日本有關史籍四種提要」及「日本軍備與一八八中日戰爭」兩篇文章，全集約有十五萬言，都是日本史的精神之作。

愛國情操流露筆端

繆氏是一位熱愛國家的歷史學者，他提倡歷史教育，不遺餘力。大約在民國二十年，繆先生即大聲疾呼，希望教育家猛省，加強國史教育，以拯救我國家民族之危急。他說：「有志之士，欲研究國家民族社會文化政治演進構成之真象，求一疏通知遠而不誣之史書，史學巨子，輒無以應之。笨拙者以讀史為畏途，閑束不觀，則謂國史毫無價值。淺陋者安於提綱挈要，目空一切，則謂國史，不過爾爾。一二逞臆之夫，肆其堯神

禹蟲之邪說，遂至舉國風靡。而最近中央大學入學試驗，二千五百數十人中，以「府兵」為國府之衛隊，「青苗」為青海之苗民者，多至二百餘人。」「國史授課時數，已少之又少，教育家尙有提議再事削減，嗚呼致辯者，豈從事教育者，皆如陳叔寶（南朝陳後主叔寶）之無心肝歟？」（註一二）繆氏的慨嘆，距今已五十餘年，現在國史教育的成效，又在那裏？無怪乎錢穆先生語重心長的說：「從事文化建設，應先加強歷史教育。」（見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七日臺北各大報）

對日抗戰期間，繆氏曾四度應西北負國防重任的軍事當局之邀，赴大西北地區，講演與考察。他說：「民國二十七年後，每歲夏秋，余輒講學西北。橫秦嶺、度隴坡、登太華、涉果蘭、遊宗周、秦、漢、隋、唐之故墟，訪靈臺、阿房、上林、西苑、曲江之遺址。感我國族之蘊藉，若是其闕碩，宅居之河山，若是其壯美。經歷之年歲，若是其悠久。余忝居講席，當此神聖抗戰之會，既不獲執干戈以臨前敵，苟對我先民盛德宏業，猶弗克論載，罪莫大焉。」（中國通史要略自序）所以他自己西北歸來，先後著有「民族寶訓」、「中國民族文化」、「西北史略」、「漢武帝經略河西考」、「國史上之戰鬥觀」諸篇，各刊印成冊，流布於世。這位愛國心極為強烈的學者，大陸淪共後不久，即被送往東北，受了很多折磨。回返南京，「病休多年」，於民國四十八年五月逝世。

附註

註一：黃佐南雅志：洪武十五年三月，改國子

學為國子監。遷都後，改稱南京國子監，以別於北京國子監。南京國子監，又稱南雍。

註二：宋書：宋文帝元嘉十五年，詔雷次宗立儒學，何尚之立玄學、何承天立史學、謝元立文學。

註三：梁武帝天監七年，乃詔開五館，置五經博士各一人。

註四：繆鳳林復蒙文通書：「弟自內子病歿，所感萬端，行年三十，常懷千歲之憂。」

註五：繆鳳林著「唯識今釋」，發表於民國十二年七月。

註六：繆鳳林：與某君論古史書。原文刊「學原」第一卷第二期。

註七：夏曾佑：中國古代史。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商務版。

註八：梁啟超：亡友夏穆卿先生。刊東方雜誌二十一卷九號。

註九：上海東文學社翻印「支那通史」，羅振玉序文。

註一〇：梁啟超：東籍月且中所言。

註一一：繆鳳林：日本論叢第一冊弁言。

註一二：繆鳳林：中國通史綱要自序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